

顧炎武與清初兩降臣——程先貞、史可程交遊考論

謝正光

Grimmell College, U.S.A.

【內容提要】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於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自江南北上之後，先後在山東、北京、山西、陝西等地結交了很多新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堅苦守節的明遺民，此事一直為治亭林生平的學者所樂道，但亭林晚年在北方的知交中，其實也包括了一些名節已虧，行誼廣遭物議的「降臣」和「貳臣」在內，其事則尚鮮為史家所注意。

根據程先貞（一六〇七—一六七三）《海右陳人集》和亭林詩文及《年譜》可以考定亭林在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後的十數載間，先後與曾經降附清廷的程先貞和史可程兩人建立過深摯的友誼；彼此之間，始終保持密切的往還。此一發現足以證明亭林晚年擇交，於甄別衡量之際，個人的「政治操守」，並非他考慮的先決條件。

歷來治明清易代前後歷史的學者，一直慣於利用「政治操守」來量度清初士人的行誼。如果單從「政治操守」的角度來考察亭林晚年和「降臣」的論交，必難獲得合理而圓滿的解釋。以程、史二人為例，亭林擇友，於個人的「政治操守」以外，至少兼顧到學術文化活動的認同和參與，以至個人的才情與習性等因素。

要之，利用「政治操守」此一「單向性的闡釋架構」來衡度清初士人的行誼，不但有欠公允，而且是不符合於從歷史本身來說明歷史的準則的。

（一）緒言

曾經有這樣一個說法：順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攝政王多爾袞（一六一二—一六五〇）率清師南下，行伍間挾之與

俱的有降附了清廷的明朝官員三人：史可程、王鑑、和程先貞。據說這是爲了招降南明弘光朝廷文武大員所佈置的三著棋，其目標分別爲史可法（一六〇二—一六四五，與史可程爲同祖兄弟）、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與王鑑爲同胞兄弟）、和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與程先貞爲摯友）【註一】

即使這個說法屬實，清廷的招降密計也只實現了三分之二。奉弘光命鎮守揚州的史可法拒絕降清，作出了與城俱亡的壯舉，於是有「揚州十日」的悲劇。而留守南京的高官王鐸和錢謙益一同率領弘光朝的文武大員數百人，出南京城郊迎清師，讓清師不廢一兵一矢，長驅入城。這些都是清史上爲人所熟知的故事了。

史可程、王鑑、和程先貞爲清廷當說客一事，根據目前所見的史料，尙難論定。但這三人之中，程先貞和史可法在入清後卻分別和以忠節見稱的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建立過深摯的友情，倒是有案可稽的。「遺民」而與「降臣」論交，事不尋常，更何況是耿亮守節的亭林？

先說程先貞吧。

（二）程先貞之降清

程先貞（一六〇七—一六七三），字正夫，號蕙菴，山東濟南府德州人。程氏爲魯西望族，科第宦途，兩皆順遂。正夫的祖父紹（字公業），父泰，分別官至工部右侍郎和建昌府通判。正夫則憑藉祖蔭，在崇禎朝官工部營繕司員。入清以後，友人和正夫詩酒唱酬，還是以「程工部」稱之的。

《清史稿》和《清史列傳》都沒有爲正夫立傳。至如他的墓誌和祭文也尙未發現，只在道光《濟南府志》收有小傳一篇。短短不滿二百字，對正夫在明清之際的行事，卻是含糊其詞：「甲申之變，「正夫」與「其師」盧世淮誅僞官。家居二十年，杜門簡出，以詩酒自娛。」【註二】

【註一】：說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五），下冊，頁七〇〇，〈程先貞小傳〉。

【註二】：道光《濟南府志》卷五十六〈人物·國朝·德州〉。又見《山東德州鄉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抄本，一九六八），頁九九—一〇〇。

「偽官」云者，當指李自成大順朝廷的官員。盧世淮（一五八八—一六五三），字德水，又字紫房，號南村病叟。【註三】崇禎末曾官監察御史。入清後被徵入京師，復原官。以病廢辭，沒有當上「貳臣」。

小傳對正夫隨清師南下事，即未提及，而入清後行事，亦只說他「家居二十年，杜門簡出」。如此一來，正夫豈非朱明的遺民了嗎？

事實上，正夫確是降附過清廷的；而他本人對順治二年策馬揚鞭，隨新主南下一事，亦未嘗諱言。他晚年作《自題小像》詩四首，其中的第三像題詩，便是追憶當時搖身變作新朝顯貴時的得意情狀的。詩前小序說：

「第三像：其頤頤間有二毛矣。乙西北謁，賜蟒衣一襲，濫江干之役，腰橫玉具，行色匆匆。」【註四】

乙酉，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正夫三十九歲。「二毛」云之，指頭白有二色。所謂「蟒衣」，即「象龍之服」，和皇帝御袍相似，但少一爪而已；這本是明朝的制度，清初因襲了下來。當年身披蟒衣、腰橫玉帶的正夫，意氣之勃發，可以想見。詩說：

「物色倉皇塵土紅，手攜一劍學從戎，丈夫漫灑平生淚，自認鬚眉與昔同。」【註五】

正夫這一序一詩，雖未明言他為清廷向錢牧齋勸降，但卻足以證明他本人確曾降附清朝。所謂「乙西北謁，賜蟒衣一襲」，明言自山東北上，入京謁新主；而「濫江干之役，腰橫玉具」，說的正是隨清師南征之事。

（三）程先貞的《海右陳人集》

正夫和他的老師盧世淮，都是清初山東著名的詩人。正夫的集名《海右陳人集》分作上下兩卷，收各體詩四百四十六首。量雖不多，但他的詩詣在他生前便已得到當時詩壇巨擘的推崇。錢牧齋序他的詩，說他「汲古起雅」，所作「清穩妙麗」【註

【註三】：盧世淮小傳，見《清詩紀事初編》，頁六九七。

【註四】：程先貞《海右陳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康熙間刻本，一九八〇），頁二七八。

【註五】：同上。

六】。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二一）也稱他的篇章「深穩而有逸氣」【註七】。牧齋和漁洋的評論，說明了正夫在清初詩壇所佔的席位。

近人鄧之誠從史學的角度來解讀正夫的作品，指出他「詩中自注，頗及時事」，有助於考史，見解尤為獨到【註八】。事實上，《海右陳人集》裏很多所謂「清穩妙麗」的詩篇，如果細加勘察，便已是極可貴的原始史料。上文利用《自題小像》中的一首七絕來證明正夫確曾降附清廷，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以下即可根據正夫的其他作品，來考見他在入清以後和顧炎武之間所締結的一段深摯的友情。

（四）亭林與程先貞

《海右陳人集》所收與亭林有關的各體詩凡十題十四首。其寫作年份大約自康熙元年（一六六二）至正夫逝世前一年（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載之間。（亦即正夫五十六歲至六十六歲、亭林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註九】。細繹正夫這些詩作，再以亭林《詩文集》和亭林《年譜》中有關正夫的材料相印證，確可考定兩人之間實有過一段不比尋常的友誼。

兩人見面論交，事在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地點在山東德州【註一〇】。論交之前，兩人身世遭逢之殊，判若天壤。明亡之前，雖然同是「復社」成員【註一一】，但正夫始終服官北京，而亭林則足不出江南。清人入關之翌年，正夫隨清兵南下，為新主奔命，而亭林則身預抗清義舉。然則在明則一朝一野，在清則敵我分明。兩人的活動，取向殊途。

【註六】：《海右陳人集》卷首錢謙益序。

【註七】：錢仲聯《清詩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順治朝卷》，頁二三〇，引《漁洋詩話》。

【註八】：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下冊，頁七〇〇。

【註九】：說據王蓮常，見氏著《顧亭林詩集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頁一〇五七。

【註一〇】：同上。

【註一一】：吳山嘉《復社姓名傳略》（北京中華書店影道光十年序刊本，一九九〇），卷二（南直·蘇州府·崑山），頁三十八（顧絳）；卷十（山東·濟南府·德州），頁二（程先貞）。

及兩人初晤，彼此的處境與心境也有很大的差距。其時亭林離鄉別井，僕僕征塵；雖在流離之際，但仍懷抱濟世雄心。而正夫則早已由絢爛趨于平淡，息影家園多年了。他在《自題小像》詩裏自敘歸老田間後的生活說：

「鼎彝尊疊，列在左右，蒼顏白髮，頹乎其中，不冠不履。」【註一一】

這和堅持「君子之學，死而後已」【註一二】的亭林，是大相逕庭的。

然而，儘管兩人過往的經歷存有根本的差異，在現實處境和對未來的展望又缺乏一致的認同，亭林和正夫卻在晚年結下至死不渝的交誼。

首先，兩人訂交之後，往來頻繁。正夫在康熙九年（一六七〇）所撰的《贈顧徵君亭林序》裏說：

「『亭林』每過吾州，輒見訪。如僑札之歡，皋、梁之說也。」【註一四】

根據亭林《年譜》，他於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北上之後，到他定居陝西（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為止，幾乎每年必到濟南，過德州而必與正夫見面。有時甚至一年之內，過訪兩三次。則兩人往還之頻密可知。亭林本人所撰《德州過程工部》一詩的起句就說：「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來」【註一五】，可證正夫在贈序裏的話，實非虛誇。

其次，兩人在離別期間，每以詩歌保持聯繫，如亭林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離開山東，取道北京初訪山、陝，在旅途中，他寄正夫五言長詩一首，備述思慕之情：

「緜上耕山日，青門灌圃時。懷人初有歎，裂素便成辭。一雁陵秋闊，雙魚入水遲。任城樓突兀，大野澤參差。物象今

【註一二】：《自題小像·第四像序》，見《海右陳人集》，頁二七八。

【註一三】：《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文集》卷四，頁九十六，〈與人書六〉。

【註一四】：正夫序收入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存萃學社編《顧亭林先生年譜彙編》（香港崇文書店，一九七五），頁一一，〈康熙九年庚戌五十八歲條〉。程序中所謂「僑札之歡」，用的是春秋時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名僑），如舊相識」的故事。清初人以亭林比喻吳季札，尚有楊自牧。自牧字謙六，又字不人，號豫齋。河北昌平人。所著《潛籟軒詩集》有詠亭林句云：「人如吳季子，道在魏西河」。《光緒昌平州志》（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頁四七七，引《潛籟軒詩集》（譚吉聰序）。

【註一五】：《顧亭林詩集彙注》，頁九五五。

來異，天心此際疑。風沙春氣亂，慧宇夜芒垂。見魅當郊舞，聞人叫廟譴。頻翻坤軸動，乍鬥日輪虧。水竭愁魚鼈，山空困鹿麋。傷心猶賦斂，舉目盡流離。旅計真無奈，朋歡更可追。秋吟酬鮑照，日飲對袁絲。蠶急當軒響，花繁繞砌枝。朱絃彌喝古，『白雪』每誇奇。劍術人誰學，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契闊，隻羽倦差池。尚媿劬勞憶，還添老大悲。幾闌尼父室，獨近董生帷。器忝南金許，文承繡段詒。清風來彩筆，疎韻落芳卮。西蜀玄芳草，東周夢未衰。會須陪燕笑，重和鄴中詩。」【註一六】

詩中如「懷人初有歎，裂素便成辭」；「旅計真無奈，朋歡更可追」；「劍術人誰學？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契闊，隻羽倦差池」；「會須陪燕笑，重和鄴中詩」等句，詞情摯到，充分流露出亭林對正夫真切的懷念。而正夫的《答亭林平陽見寄》二律，則冥想亭林在旅途中長路漫漫的孤苦，表達了對故人的一往深情：

「西去憐君似轉蓬，傳來尺素到牆東。曠懷晉國雲山遠，回首吳門煙水空。世局頻勞悲失馬，天涯漫遣幕冥鴻。王孫何事歸猶未，芳草淒淒滿舊叢。」

(其二)

「懷古遙應處處同，青鞵布鞵御長風，猶聞采蕨思殷社，漫道歌薰入舜宮。山色千重遮冀北，河流萬里下蒲東。看君行邁劬勞苦，五噫誰知廡下鴻。」【註一七】

不久，亭林結束山陝之行，重過山東德州，和正夫敘舊。亭林《德州過程工部》，即作於此時：

「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來。每逢佳節至，長得草堂開。老桂香猶吐，孤鴻影自迴。未論千里事，一見且銜杯。」【註一八】

結句「未論千里事，一見且銜杯」，充分展現出兩人久別重逢歡欣的心情。正夫《顧亭林從大同來暫過東昌》詩亦記此事：

【註一六】：題作《酬程工部先貞》，《顧亭林詩集彙注》，頁九〇五—九〇六。

【註一七】：《海右陳人集》，頁一八一—一八二。

【註一八】：《顧亭林詩集彙注》，頁九五五。

「一夕三年別，疏證話舊游。長征還帶劍，遠望欲登樓。月落青山夜，雲迴紫塞秋。故鄉何處是？此地即并州。」
(其二)

「吾道看如此，天涯去住難。班荆留款坐，剪韭勸加餐。暮雨吟蛩切，秋風落雁寒。仲連臺畔路，明日又漫漫。」【註一九】

上文所引正夫贈亭林的《序》裏又說：

「東吳顧徵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于書無所不讀，習熟國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貫會通，折衷而守之，卓乎爲經濟之學者也。……『亭林』爲余談經說史，不憚娓娓，或留信宿，或浹月經時，然後乃去。」【註二〇】

這段話說明了正夫視亭林爲學術上的畏友；所謂「談經說史」，正是維繫這份水乳交融的友誼的一個重要因素。康熙九年（一六七〇），亭林應正夫的邀請，在德州授《易》閱月，便是一個好例子。

亭林晚年治《易》，並屢次在書信上和友人討論他讀《易》的心得【註二一】。他在德州課《易》，詳細內容已不得而知。但從他於課畢後，以詩代柬所寫的一首五言古詩來看，他解《易》不外乎注心在日用倫常、輔時及物之道上：

「在昔尼父聖，韋編已三絕。況於章句儒，未曉八卦列。相看五十餘，行事無一達。坐見悔吝叢，舉足防蹉跌。日杲乃研思，猶幸非大耋。微言詎可尋，斯理庶不滅。寡過殊未能，豈厭丁寧說。是時秋雨開，涼風起天末。蟋蟀吟堂階，疎林延夕月。草木得堅成，吾人珍晚節。亮哉歲寒心，不變霜與雪。憂患自古然，守之候來哲。」【註二二】

亭林在詩中所表現對易義的理解，和他在《與任鈞衡》札中所說是一脈貫通的：

【註一九】：《海右陳人集》，頁二〇—二二。

【註二〇】：正夫序收入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

【註二一】：《亭林文集》卷三，頁四四—四七，〈與友人論易書〉；卷四，頁七十七，〈答子德書〉；頁九十五，〈與友人書二〉。又《亭林餘集》，頁一七六—一七七，〈與任鈞衡〉。

【註二二】：《顧亭林詩集彙注》，頁一〇一四—一五。亭林德州講易事，見《年譜》〈康熙九年庚戌〉條。

「易於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實示人。學者玩索其義，處世自有主張。」【註二三】
正夫隨亭林習《易》，亦有詩記其事：

「秋色依然入薜蘿，高軒又見故人過。三時快雨來千里，一夕清風徧九河。大易迴開懸象奧，新書遙贈汗牛多。對君自覺無餘想，正好銜杯和郢歌。」【註二四】

課畢臨別，亭林復贈正夫以十卦。正夫乃取以爲齋名，並賦《首春自題十卦齋》一首【註二五】。中有句云：「陳編更作千金帚，老屋重題十卦齋」。在《酬亭林次韻見和》【註二六】裏，又反覆提及這個新齋名：「病身懶和三都賦，好客閒過十卦齋」；「老鯨枉憶三星戶，困學仍居十卦齋」。這都證明亭林引起了正夫對《易》的興趣。

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三月，亭林因牽連黃培詩案，被逮下濟南府獄，同年十月事始解，亭林在獄中時，正夫有《寄顧亭林》兩首，對亭林蒙難的境況，作了側面的描寫。近人研究亭林生平，尚無注意及此的。茲特彙錄於下：

「秋意被梧桐，回陰覆庭砌。悠悠我所思，乃在明湖水。萋萋彼何人，南冠繫鍾子。援琴非不工，誰能察識此。黃鵠罹網羅，毛羽紛難理，何時遠翱翔，一舉橫千里。」

（其二）

「素書託錦鱗，遠來報曲折。浩氣迴無殊，纏線字不滅。嗟惟夏侯生，千載傳風烈。雖無次公賢，談經正未輟。余老病身，崎嶇路難越。尚賴夢魂通，隨風度明月。」【註二七】

《海右陳人集》裏和亭林有關的詩，還包括兩人遊屐所至的【註二八】，酬贈亭林在各地知交的【註二九】，和記敘亭林

【註二三】：《亭林餘集》，頁一七六—一七七。

【註二四】：《海右陳人集》頁二〇〇—二〇一，「立秋日王北山過訪同聽亭林講易並貽所著槐軒集」。

【註二五】：《海右陳人集》，頁二二四。

【註二六】：《海右陳人集》，頁二二四—二二五。

【註二七】：《海右陳人集》，頁六六—六七。

【註二八】：如《海右陳人集》頁一九一—一九二有《過蘇祿國東王墓》；《顧亭林詩集彙註》頁九五六—九五七亦有《過蘇祿國王墓》。

親屬來訪的【註三〇】。而亭林的文集裏，也收有他爲正夫所輯德州先賢遺詩而撰的序文一篇。【註三一】凡此種種，都進一步說明正夫和亭林往還之密，相知之深。

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十月，正夫逝世，得年七十六歲。正夫卒後三日，亭林始自章丘抵德州；原是趕來訣別的，但已不及復面了。亭林有《自章丘回到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詩：

「高秋立馬鮑山旁，旅雁初飛木葉黃。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媿郢君章。」【註三一】

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正夫入壙，亭林又自濟陽往德州送葬，復有《送程工部葬》五古一首：

「文獻已淪亡，長者復云徂。一往歸重泉，百年若須臾。寥寥揚子宅，惻惻黃公墟。揮涕送故人，執乎存遺孤。末俗雖衰漓，風教猶未渝。願與此邦賢，修古敦厥初。」【註三二】

正夫之喪，亭林兩赴德州，並親爲執紼，又先後有詩兩章悼輓。正夫在亭林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是無容贅辭了。

（五）亭林與史可程

相傳與正夫一道隨多爾袞下江南，且曾向史可法勸降的史可程【註三四】，也是亭林晚年在北方所締交的又一摯友。

史可程，字赤豹，河南開封祥符人。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進士，選庶吉士，故朋友多以「史庶常」稱之。赤豹是史

【註二九】：《海右陳人集》頁二〇三—二〇四有《寄張力臣》；頁一九四—一九五有《答李天生》。張、李皆亭林摯友。

【註三〇】：《海右陳人集》頁一三九—一四〇有《亭林攜令侄達夫茂才見訪》。達夫名洪善，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進士，見《顧亭林詩集彙注》，頁一〇九八—一〇九九。《兄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關淞江之役書此以示之》。

【註三一】：《亭林文集》卷二《程正夫詩序》，頁三八—三九。潘道根誤以此文爲正夫《海右陳人集》而作。見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康熙六年丁未五十五歲）條「作程正夫詩序」下「道根按」。

【註三二】：《顧亭林詩集彙注》，頁一〇五六—一〇五七。

【註三三】：《顧亭林詩集彙注》，頁一一一〇。

【註三四】：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程先貞小傳》。

可法同祖弟。有《觀槿堂文集》【註三五】，未見。

赤豹在易代之際的政治操守，又不如程先貞，因為赤豹在降清之前，且曾降附李自成，曾以明朝的原來官職，服事大順朝廷。李自成一度有意命赤豹以家書向史可法招降，只是戎馬倥傯，來不及付諸行動便被迫自北京撤軍。赤豹在弘光朝之所以納入「從逆諸臣」之列，是有根據的。【註三六】

世所傳誦的多爾袞致史可法書裏有云：「及入關破賊，識介弟於清斑」，「介弟」云者，即指赤豹。【註三七】可知赤豹也會降清。只是他替清廷勸乃兄投降事，未有明證。

清兵定江南後，赤豹亦未再入仕途。是出於自願，抑別有內情，皆不可知。只知道他先後僑寓南京和宜興，以北人而居南，和亭林以南人而居此，恰好相反。赤豹死時，已值康熙中葉了。

亭林和赤豹初晤論交於山西太原，時在康熙二年（二六六三），後於亭林和程正夫締交一年。赤豹有《太原喜晤寧人先生賦贈》詩：「翰墨遙傳十載餘，卻憐邊郡識君初」；又有《贈寧人社翁》詩：「客遊與子親，立談愧我疏」【註三八】，都是兩人在太原初次見面的明證。

亭林也有《酬史庶常可程》五言長詩一首，記論交事：

「伊尹適有夏，太公之朝歌，吾儕亦此時，將若蒼生何？跨驢入長安，七貴相經過。不敢飾車馬，資用防其多。豈無取諸人，量足如飲河。顧視世間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君今寓高都，連山阻巍峨。佳詩遠寄將，建安激餘波。想見蕭寺中，抱膝苦吟哦。古人尚酬言，亦期相切磋。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註三九】

【註三五】：《顧亭林詩集彙注》頁八三二引戴注。

【註三六】：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卷二十二，頁六〇七。《明史輯略·紳志略》，《從逆諸臣》條。

【註三七】：《顧亭林詩集彙注》，頁八三一。

【註三八】：同上。

【註三九】：《顧亭林詩集彙注》，頁八三一。

詩中有兩處可堪注意：「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亭林於赤豹前此失節事，似無意深責，而且有為其開解之意。收結二韻：「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則於赤豹往後的行藏，有所致意：勸其「無受惠」於長安之「七貴」，以免負荷過多；又勸其「無倦游」，蓋一旦「倦於游旅，則壯志蹉跎矣」。【註四〇】

赤豹酬答之詩，題目中便拈出亭林詩收結二韻：「寧人盟長答余，詩云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物老則息，何可長耶受惠難負荷君子哉言乎載廢一章寄謝寧人知不我遐棄也」。詩言：

「孔說七十二，墨突不至黔。所由塗已廣，利已一何廉。廓然觀天道，『陰符』教我嚴。受命為孤蓬，乘風未得淹。饑來四方走，避惠如避鉗，偶至逢人喜，事過心愈貼。東舟響皎日，安得似影潛？幸有同心侶，隱然無苟甜。展卷未及終，汗浹敝衣沾，白藏適當令，羈壞屬惓惓。資世何必多，儉德足自占。踞承仁者贈，拜乎想三緘。」【註四一】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訂交後六載，赤豹和亭林有河北大名之會；與會者並有曹溶（一六一三—一六八五）。赤豹與亭林均無詩記此事，幸曹溶有五律兩首，足資考述眾人當年讌遊的情狀。《靜惕堂詩集》卷廿一有《同赤豹飲介菴金灘署二首》及《再同赤豹寧人飲介菴署二首》兩題。後一題的詩兩首說：

「客自殊方至，同探古署寒。盛名懸玉節，公讌密雕盤。晷近吹葭短，觴因授簡寬。乃時揚大業，送喜到征鞍。」

（其二）

「地勢燕齊合，官階屏翰尊。肯容諸傲士，累夕共清言。夜久潛陽動，天遙古怨存。塵中分平易，歲晚臥蓬門。」【註四二】

【註四〇】：《顧亭林詩集彙注》，頁八三四。

【註四一】：《顧亭林詩集彙注》，頁八三四。

【註四二】：曹溶《靜惕堂集》（雍正三年李維鈞序刊本），卷二十一，頁十下。《同赤豹飲介菴金灘署二首》云：

「河朔還高會，璇樞指仲冬。澤梁冰未結。沙館雁初濃。揆藻多遷謫，陳觴見肅雍。花間傳玉漏，清氣逼銅龍。」

（其二）

「離恨從今寫，論文不厭真。錦堂燃燭夜，鄰苑覆杯春。雪色催新賦，山光緩去輪。挽留看勝地，悵悵白頭人。」

顧炎武與清初兩降臣——程先貞、史可程交遊考論

介菴者，當指金灘令。金灘屬河北大名府治。「肯容諸傲士，累夕共清言」，可見主客秉燭夜宴之樂。

赤豹是一個名節有虧的士人，亭林晚年和他見面訂交後，卻曾稱之為「君子」並對他有所期許。集中《與人書六》裏說：「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穫之歎乎？昔在澤州，得拙詩，深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註四三】

任昉（四六〇—五〇八）《求為劉壻立館啓》說：「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註四四】，亭林札中隕穫之歎，與此意同。合前引亭林酬赤豹詩中「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句而觀之，可知赤豹入清後曾因貧賤而遊食於達官大吏之門。亭林乃再三勸勉他不可因貧賤而喪志。亭林對赤豹既有所寄望，適足以說明兩人情誼殊非泛泛。

（六）結語

亭林於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北上後，先後在山東、北京、山西、陝西等地結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堅芳守節的遺民像張爾岐（一六一二—一六七七）、殷岳（一六〇二—一六六九）、孫奇逢（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傅山（一六〇七—一六九〇）、和王弘撰（一六二二—一七〇二）等，都一直為治亭林生平的學者所樂道。有人甚至因為亭林和這些遺民建立了道義之交，而推斷他晚年在北方的活動，主要在聯絡各地的志士，共謀抗清復明的義舉。【註四五】

【註四三】：《亭林文集》卷四頁九六，〈與人書六〉。

【註四四】：任昉文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光緒版，一九八七）《全梁文》卷四十三，頁八下。

【註四五】：關於顧炎武的歷史評價，沈嘉榮有頗詳細的論述。見其《顧炎武論考》（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頁三三四—三八四。又參閱王衛平《十年來的顧炎武研究》，載《中國史研究動態》，一九九三：五。

亭林「北上抗清說」，較具代表性的，前有趙儂生《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的反清鬥爭》收入氏著《史學新探》（上海新知出版社，一九五五。頁九一—一〇三）。趙氏新著《顧亭林與王山史》（齊魯出版社，一九八六）仍主舊說。近有黃正藩《顧炎武北上抗清辨析》，載《蘇州大學學報》，一九九六：二。

亭林晚年的知交之中，其實也包括了一些名節已虧、行誼廣遭物議的「降臣」和「貳臣」在內。本文所述的程先貞和史可程之外，至少還有像孫承澤（一五九二—一六七六）和曹溶（一六一三—一六八五）那樣在順、康兩朝的政壇上資望頗高的「貳臣」；亭林和孫、曹之間，也有類似於他和程、史所建立的深摯情誼。【註四六】

歷來研治亭林生平和學術的學者，對他入清後的行誼。都極力推崇，可說是有褒而無貶的。對亭林與「降臣」、「貳臣」往還頗密此一史實，自然無暇兼顧；至今為止，也就鮮有專題論述。即偶然有治清詩的學者注意及此，亦只提出過一些比較含混的說法。像亭林之結交程先貞，鄧之誠便認為不過是「細節」，不足深論【註四七】；鄧氏所持的準則，似乎是「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相反地，王蘧常先生則認為程、史既是大節已虧的人，亭林和他們交往，不能以「細節」視之。但是究竟應該如何對待此一史實呢？王先生卻也未曾提出他的觀點來。王先生再三審度，對「以撐柱正氣為己任」的亭林，竟屈身與失節的人「相契之深如此」，【註四八】，最終也只得浩然長歎，而歸之為「不可解」而已。

鄧之誠話裏的「細節」，和王先生所說的「正氣」，其立足點顯然都是儒家思想裏的「忠節」觀念。亭林既自清末民初以來，一直被推崇為「忠節」的最高象徵，「政治操守」也就慣性地成為審度亭林生平的惟一量尺。碰上「堅苦守節」的亭林而甘心稱「降臣」、「貳臣」論交此一史實，「政治操守」這把量尺怎好用上呢？勉強說這事是「細節」，或直截了當歸之為「不可解」，都不過是出於無奈的「遁辭」。至於其他治亭林之學的人，對此一史實，或視而不見，或避而不談，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所說，絕非有意低估以「忠節」觀念來衡量清初士人的重要性。事實上，研治明清易代前後的歷史，誰也不能漠視個人「政治操守」在當時廣受注目的現象。即如「降臣」一事，亭林便在作過頗詳細的歷史考索之後，毫不猶豫地痛加貶

【註四六】：謝正光《顧炎武、曹溶論文始末——明遺民與清初大吏交遊初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四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五。

【註四七】：《清詩紀事初編》，下冊，頁七〇〇。

【註四八】：《顧亭林詩集彙注》，頁八三一—八三二。

斥。《日知錄》卷十三《降臣》條說：

「記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蔡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弑。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乎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日磾於禁之流，至于嘔血而終，不敢面見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謙卑。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敘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之乎？……而降城亡子，不恥於人類者矣。」【註四九】

亭林既曾視「反顏事讎，行若狗彘」的「降臣」為「不恥於人類」，但卻和分別降附過清廷和李自成的程先貞和史可程交深而相契。那麼，亭林豈非言行不相符的人了嗎？

如果單從「政治操守」的角度來衡量，且只就此事而言，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但本文的目的，絕非立意於以此厚謗亭林。相反地，本文的要旨在於以亭林晚年擇友為例，說明「政治操守」雖然重要，但仍不足以駕御一切。作為「忠節」最高象徵的亭林，亦不得於「政治操守」之外，全無考慮，又何況他人？

本文所掌握的資料，雖極有限，但已能說明亭林晚年擇友，於衡量甄別之際，個人的「政治操守」並非考慮的惟一因素。進言之，即使「政治操守」確在考慮之列，其所佔的比重亦不甚大。以亭林和程先貞、史可程的交遊為例，亭林於二人以往的「政治操守」，顯然未視為友朋交納的先決條件。亭林所重視的，卻在於他和程、史二人在文化學術活動的認同和參與。如對易理的探討，在詩歌創作上的往復切磋，乃至於如程先貞所說的「談經說史」等。

再者，亭林擇友，個人的性情，我想必是他所考慮的重要的一環。程、史二人，雖於大節有虧，與亭林必是性情相近，才能和他相處得水投孔般融洽。下面多舉一例，說明亭林和程先貞之間，必有於「政治操守」之外而更為兩人所共同寶愛之物。

【註四九】：顧炎武《日知錄》（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頁三三三。

亭林自青年時代即嗜酒，在江南時常與歸莊（一六一三—一六七三）和其他親友豪飲，自詡有三、四斗之量【註五〇】。他贈程先貞的詩有「一見且銜杯」句，輓程詩也說「惻惻黃公壚」；而程先貞寄亭林詩也有「正好銜杯和郢歌」，都說明了程先貞也嗜酒；兩人其實是很投契的酒友。然則兩人傾杯對飲，論文談藝的樂趣，又何嘗不是維繫和增進他們之間的交誼的重要因素之一呢？

總括來說，亭林晚年擇友，既未以個人的「政治操守」作為衡量的惟一標準；他所考慮到的，至少也包括了學術文化活動的參與和認同，以及個人習性的相近等因素。

然而，近百年來的學者，對亭林以及和他同時代的士人們的行誼的審度，卻一直離不開「政治操守」這把量尺；敘事論人，終究仍局限在五倫中的「君臣」一義之上。對於其他一切複雜糾纏的人情物理關係，皆不措意。用這樣一個導源於乾隆朝修「貳臣傳」之際的「闡釋架構」來評價亭林以及其他清初的士人，不但有欠公允，也是不符合於從歷史本身來說明歷史的準則的。

要之，研究明清易代前後的歷史，放棄用「政治操守」作單向性的探討和闡釋，也應該是時候了。

【註五〇】：亭林嗜酒，其《文集》中即人屢有記述。較明顯者如卷五，頁一九《吳國初行狀》中有云：

……而餘與同邑歸生獨喜為古文辭。……已而又得吳生。……而炎武有叔蘭服……姊子徐履忱……五人各能飲三四斗。

又：《亭林佚文輯補》中《與歸莊手札》七首。其第二札云：

別兄歸至西齋，飲酒一壺，讀《離騷》一首，《九歌》六首，《九辯》四首，士衡《擬古》十二首，子美《同谷》七首，《洗兵馬》一首。壺中竭又飲一壺，夜已二更。一醉遂不能起。日高三四丈猶睡也。月之二日將往千墩，而兄之期當在初七八，屆時更以酒三爵榼一架奉訪於西郊。……

顧炎武與清初兩降臣——程先貞、史可程交遊考論

· 一四三 ·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五卷 第三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ing *I-min* and the Defectors: The Case of Ku Yen-wu,
Ch'eng Hsin-chen, and Shih K'o-ch'eng**

Andrew C. Hsieh

Grinnell College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Ku Yen-wu (1613-1682), an anti-Ch'ing activist, made many new friend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last twenty-five years of his life. Also uncontested is the fact that many of Ku's new friends shared his devotion to scholarship, as well as his political stance. In fact, on the basis of these friendships, a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concluded that Ku continued to carry on his struggle against the new regime even after moving northward in 1657.

What very few scholars know, however, is that among Ku's many new friends were also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who had displayed highly questionable political ethics during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Among these were Ch'eng Hsin-chen and Shih K'o-ch'eng, both of whom had first surrendered to the Ch'ing in Peking in 1644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Manchu troops in their southern expedition of 1645; during the campaign, on behalf of the conquerors, Ch'eng and Shih attempted to persuade key Ming generals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s to defect to the Ch'ing. Careful readings of Ch'eng Hsin-chen's complete works, Ku's own poetry, and other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ources reveal that Ku befriended both Ch'eng and Shih during the early 1660s, and that these close friendships lasted until Ch'eng's death in 1675 and that of Ku in 1682.

Our discovery of the close friendships between Ku and the two defectors suggests that proper political behavior was by no means a requisite in Ku's choice of friends. Further, it demonstrates that,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Ch'eng and Shih, common interests in scholarship, poetry, and other forms of cultural activities figured so prominently in Ku's choice of friends that he was willing even to befriend individuals whose political behaviors directly violated his own political ethics. Finally, it seem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Ku, contrary to the views of some recent scholars, placed a much higher value on cultural affinity than on political agreement; he seemed to no longer expect all his friends to share his political views.

Scholars thus far have customarily viewed those who surrendered to the Ch'ing and those who remained loyal to the Ming as two bitterly hostile groups; in this view, any communication between *i-min* and the defectors is likely to be unimaginable. Ku's close friendships with these two defectors have significantly called into question this commonly accepted view. In fact, if Ku, the exemplar of Ming loyalism, did not himself hold political ethics as important in his choice of friends, it would seem that we need to cease evaluating early Ch'ing literati pure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political choices. It is perhaps time to abandon the one-dimensional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g-Ch'ing transition, in which political behavior has seemed to be the sole measure of an individual's accomplishments.

Key word: Ming *i-min* 明遺民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s 一二九 through 一四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